



应用语言学视域下隐喻的认知机制与 跨文化变体研究

张玉娟

(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8)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Cross Cultural Variations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Zhang Yu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Jiangxi)

Abstract: Metaphor, as a cognitive thinking mode and linguistic rhetorical strategy, is widely used and recogniz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thnic groups, and fields worldwide. Linguistic researchers are gradually shifting their research on metaphor from theoretical cogni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lthough cognitive theory remains its founda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exploring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the field of metaphor research.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n help u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language u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etaphor is not only a tool for linguistic rhetoric,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humans to perceive the world.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which helps us to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of metaphors, we can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in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not only deepens ou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but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metaphor.

Key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Cross cultural research; Variant analysis

摘要: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模式和语言修辞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被不同国家、民族和领域广泛运用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对隐喻的研究正逐步从理论认知转向真实语言交际应用的实证研究, 尽管认知理论仍是其基础, 但可以认为, 从应用语言学视角对隐喻进行探讨, 标志着隐喻研究领域的新篇章的开启。通过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隐喻进行深入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隐喻的本质及其在语言使用中的体现。在应用语言学的框架内, 隐喻不仅作为语言修辞的工具, 而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此外, 通过对隐喻跨文化变体的分析,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隐喻使用的差异性和共性, 这对于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本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隐喻的认知理解, 而且为隐喻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隐喻认知；跨文化研究；变体分析

关于隐喻的研究，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隐喻及其跨文化变体，研究真实语境下的语言规则、语言修辞以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问题^[1]。本文在深入研究隐喻的概念及其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隐喻的跨文化变体。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模式。通过对隐喻的跨文化变体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和意义，从而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更为有效的沟通策略和方法。

一、隐喻的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人们基于个人的体验以及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普遍将隐喻归类为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隐喻被视为一种非常有用的文学修辞手法，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表达之中。然而，直到1980年，人们对隐喻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一年，一本名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书籍问世，标志着现代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在这本书中，美国学者乔治·莱考夫（G.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Johnson）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隐喻概念，即“隐喻概念系统”（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深植于人们学习和生活中的思维方式。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理论指出，隐喻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表达句式。这种句式是经过归纳总结的，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例如，当人们描述“爱情”这一抽象概念时，常常会使用“爱情如旅程”（Love as journey）这样的隐喻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生动形象地将“爱情”比喻成人生中的一段“旅途”，从而传达出“爱情就像一场旅途”的隐喻概念^[3]。在这种情况下，“旅途”充当了源域（source domain），而“爱情”则成为了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的投射过程遵循一定的规律，它是单向的、非随意性的^[4]。这

种投射过程使得人们能够通过一个熟悉的概念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个相对陌生或抽象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隐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还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

二、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认知研究

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便运用社会语境观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隐喻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并强调了隐喻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应用及其作为特定人群语言运用能力的体现。隐喻的认知功能在于通过概念替换实现新的理解，并在特定体裁中达成交际效果。近年来，诸多语言学家重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观点的正确性和前瞻性，他们主张将语言、认知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考量，以语言运用为核心，开展隐喻研究。卡梅伦、格雷厄姆等学者的先锋性工作预示着应用语言学领域中隐喻研究的新篇章即将开启。

（一）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理论框架

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下，隐喻研究需借鉴传统语言理论与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交际中语言运用的本质与作用为核心，综合考虑语言运用中的各种因素（如交际目的、语境、词义、语用等）的作用及影响，构建符合应用语言学中心思想的隐喻认知理论框架^[5]。该框架重点研究概念结构向语言使用和语言形式的转变。

应用语言学家卡梅伦提出，从语言运用视角审视隐喻现象，可得出两种主要的元理论含义：首先，隐喻在应用语言学下的理论研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文化、认知、语言资源（包括语言形式与语言能力等）、交际目的、处理要求等综合影响因素，以实现语言的关注；其次，必须限定并不断修正用于实证研究的隐喻理论框架，以确保实证研究结果与真实隐喻处理过程的一致性^[6]。

为了适应隐喻的多方位理论与实证研究，卡梅伦提出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以归类 and 阐释隐喻现象，进而限定真实语言材料的选择与分析方式。卡梅伦的隐喻应用语言学理论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理论层，主要进行隐喻的理论分析、范畴化及识别，考察隐喻使用者和语篇中隐喻的任务；处理层，观察个体在隐喻使用与理解中的



即时处理,考察社会文化和语篇情景;神经学层,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

(二) 隐喻本质在语言运用中的体现

隐喻研究不仅需关注语言现象,还需重视语言形式,这些在隐喻处理和理解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应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中,研究者需着重考虑隐喻在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的影响。

语言研究中的语言运用研究需结合表层语言及深层概念,因此应用语言学家将隐喻分为语言隐喻与概念隐喻两大类。语言隐喻是指通过隐喻方式实现对事物的理解,语篇中语言运用具有语义、对比、修辞等效果^[7]。若简单将语言隐喻概括为概念隐喻,将限制对隐喻的深入研究,并忽略隐喻中各种语法特征在语篇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语篇隐喻:“Our relationship is at a crossroad(我们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概念隐喻:“Love is a journey(爱情就像一场旅途)”,这两个例子的隐喻基本式(AISB)揭示了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在语言形式、语言运用中的差异,因此,在应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中,需重视语言形式、语言运用的变量作用。

在隐喻的AISB中,认知研究认为名词性是本体A与喻体B的基本属性,但这种理解可能会误导真实语言交际中的隐喻研究。因为在许多类型的语篇中,动词隐喻的出现频率高于名词隐喻,且本体与喻体具有广泛的语言形式(如词素、短语、句子等)。例如:“Instead, matter, radiation and forces are tangled together in a totally unfamiliar scrum(相反,物质、辐射和各种力纠缠在一起,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在这个例句的隐喻基本式中,隐喻的本体被隐藏,接收者需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测本体,但此过程并不会增加接收者的处理负担^[8]。因此,在实际语言运用中,隐喻的理解相当于一个有目的的、基于语境的处理过程,这更易于接收者理解隐喻的真实含义。

三、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跨文化变异分析

在隐喻意义理解方面,语言学家于睿提出了一种观点,即隐喻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明确的源域经验映射至未明确的目标域,从而促进人们对目标域特征的重新认识。在应用语言学领域,隐喻被

区分为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根据于睿对隐喻意义的阐释,概念隐喻符合其提出的隐喻映射原理^[9]。在自然语言系统中,概念隐喻反复出现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这成为人们识别概念隐喻的重要标志。随着跨文化研究与应用的日益广泛,隐喻这一语言现象逐渐展现出跨文化变异的特征。基于应用语言学的视角,隐喻的跨文化变异可细分为三大类,具体分析如下:

(一) 常规隐喻的跨文化变异

在一般情况下,特定的常规隐喻遵循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模式。然而,在实际的跨文化隐喻应用中,由于特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常规隐喻的映射模式出现了差异,从而形成了跨文化变异的类型^[10]。众多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特别关注跨文化因素在隐喻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与影响。认知语言学家格雷迪将概念隐喻划分为初级隐喻和复杂隐喻两种类型,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初级隐喻相比,复杂隐喻具有更高的文化归属感。

在隐喻的跨文化应用中,初级隐喻的映射过程转变为“意象图式——抽象体验”,即运用普遍的概念隐喻将始源域的结构转向抽象领域,进而产生初级隐喻的跨文化变异。复杂隐喻涉及将不同的主要隐喻相结合,在跨文化应用中,其变异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复杂隐喻受文化影响的程度较高,不同文化会导致隐喻映射中特殊域的差异;其次,复杂隐喻的跨文化变异现象易发生在第二种隐喻出现阶段,并且变异情况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最后,从历史视角来看,隐喻的始源域反映了国家历史和民族特性,这些因素也容易导致隐喻的跨文化变异^[11]。

(二) 相同映射、不同价值判断的隐喻跨文化变异

“始源域——目标域”是隐喻的常规映射模式。通常情况下,相同的映射模式能够得到相同的价值判断。然而,在跨文化语言运用的背景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这构成了隐喻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另一种跨文化变异类型,即相同映射的“始源域——目标域”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这种跨文化变异类型不利于学习者掌握隐喻表达中的特定文化内涵,进而影响学习者与他人的交流。



此外,在隐喻的跨文化交际中,学习者常常以主导地位的修辞惯例来认识和学习特定的隐喻,但这种认识会因言语团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容易导致相同映射、不同价值判断的隐喻跨文化变异。针对 Littlemore 在隐喻研究中提出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对于隐喻所承载的价值判断问题, Hofstede 在 1980 年设计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验证了 Littlemore 的结论^[12]。当教师与学生在教和学具有价值判断的隐喻时,双方都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识别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这对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除了有益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普遍性程度的隐喻跨文化变异

与其他修辞格相比,隐喻的使用普遍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普遍性程度与其他修辞格相比差异较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隐喻的跨文化变异现象尤为突出。因此,普遍性程度的隐喻跨文化变异成为隐喻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第三种跨文化变异类型^[13]。

关于隐喻第三种普遍性程度的跨文化变异类型的研究,语言学家 Charteris-Black 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14]。在研究过程中, Charteris-Black 选取英语和马来语作为主要的对比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在跨文化应用中,隐喻使用的普遍性具有较大的扩展性,适用于不同的讨论领域。目前,关于隐喻的第三种跨文化变异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需要更多的语言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这对于人们认识与应用隐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认知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语言表达中的修辞手法。它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以及各个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运用^[15]。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帮助人们在思维和表达中构建起丰富的意义体系。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对隐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尤为显著,导致隐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理解中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差异和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隐喻,学者们需要站在应用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认识隐喻的本质及其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表现。通过对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变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究,学者们可以揭示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隐喻理论的理解,而且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对隐喻的认知意识和运用能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学习者在实际交流中更加灵活和准确地运用隐喻,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认知语言学视域下隐喻的多维动态建构模式及其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496-508+639.
- [2] 王文斌.《汉语隐喻性成语的概念整合机制及其认知理据——基于语料库的实证分析》[J]. 现代外语, 2022, 45(3): 329-341.
- [3] 蓝纯.《从认知视角考察汉语“心”隐喻的英译策略及其文化适应性——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23, 44(2): 112-121.
- [4] 胡壮麟.《新时代背景下多模态隐喻的认知建构路径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变异特征分析》[J]. 外国语, 2021(6): 2-12.
- [5] 王寅.《应用语言学框架下概念隐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 外语界, 2022(5): 45-54+80.
- [6] 李福印.《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概念隐喻神经认知机制研究——以空间隐喻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1): 36-48+159.
- [7] 张辉.《政治话语中战争隐喻的认知语用分析及其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研究》[J]. 现代外语, 2021, 44(6): 783-795.
- [8] 刘正光.《汉语古诗中“月”意象的概念隐喻网络及其英译认知转换模式探究》[J]. 中国翻译, 2022, 43(4): 89-98.
- [9] 周榕.《跨文化交际中动物隐喻的认知差异及其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3(2): 78-87.
- [10] 董敏.《商务谈判话语中概念隐喻的认知语用功能及其跨文化适应策略研究》[J]. 外语学刊, 2021(5): 67-75.
- [11] 孙毅.《认知翻译学视阈下《红楼梦》情感隐喻的英译策略及其接受效应研究》[J]. 外语教



学,2022,43(6):87-95.

[12]汪少华.《中美政治话语中“旅程”隐喻的认知对比研究及其意识形态阐释》[J].外国语,2023(3):45-55.

[13]谭业升.《认知翻译学视角下隐喻翻译的创造性重构模式及其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外语,2021,18(5):102-111.

[14]赵秀凤.《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下新闻漫画中隐

喻的认知构建机制研究》[J].外语研究,2022(4):56-64+112.

[15]魏在江.《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汉语新兴隐喻的认知机制及其社会文化动因分析》[J].当代语言学,2023,25(3):234-246.

作者简介:张玉娟(1993-12),女,汉族,江西南昌,硕士,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